

用“参与”重建农村公共文化认同 ——基于武汉市蔡甸区农村文化建设的实证分析

胡海鹏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本文通过对武汉市蔡甸区农村文化建设的实证分析,探寻当前我国农村文化建设的主要思路,分析我国当前农村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指出农民参与农村建设的核心,农村文化建设的目的在于通过重建村庄的公共性,达到构建新型农村公共认同。实现农村社会的持久稳定,最根本的是实现农村社会在文化上的和谐认同,而农村社会文化的和谐认同的基础在于农民对公共文化的“参与”。通过参与,才能消弭农村的认同危机,重建农村的公共认同,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关键词]农村文化建设;农村公共文化;文化认同;参与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684(2009)05-0067-05

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部署,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二十字目标,其中就包含了农村文化建设的内容。在全国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农村文化建设开展得如何,基层政府和农村在新农村文化建设方面做了哪些工作,村民对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参与情况如何,新农村文化建设当前面临的困难有哪些,基层在农村文化建设方面有什么好的机制和做法?带着这些问题和思考,笔者在今年6月对武汉市蔡甸区农村文化建设进行了走访调研,透视我国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现状和问题,以期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武汉市蔡甸位于武汉市城郊,地处江汉平原,该地区既有典型农业耕作区,又有亦工亦农的半农业区,同时还有城镇化的农村社区。在经济形态上涵盖了我国农村各个地区的一些基本特征,所以在样本选择上具有一定典型性和代表性。同时,笔者在农村调研访谈是通过抽样选择的方式,力图涵盖本地区各种类型的村庄,在样本

选择上既有经济比较发达位于市镇的中心村,还有距离市镇较远的偏远村,亦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城郊村。应该说村庄的选择上是比较科学的。对这些村庄进行文化建设调查,可以透视我国农村文化建设的基本状况,所出现的问题也反映了当前我国农村文化建设的现实。

一、蔡甸区农村文化建设的基本情况——经济实力决定文化建设

笔者在调研蔡甸区农村文化建设期间,首先向该地区负责宣传工作的领导了解当地农村文化建设基本情况。该领导在大致介绍了蔡甸区开展农村文化建设的基本情况之后,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一个地区的农村文化建设好坏最主要还是取决于该地区的经济状况,他指出,在农村文化建设方面全区做得比较好的都是那些经济状况比较好的村庄。他对于农村文化建设的这一看法,引起了笔者的兴趣,在之后的下乡走访过程中,对于农村文化建设是否呈现出

[收稿日期]2009-07-31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8年度重大项目“现阶段农村文化变迁与和谐文化建设”(08JJD810159)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胡海鹏(1985-),男,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研究方向:当代中国政治社会问题。

这样的特征也就细心地加以留意。从走访的实践来看,无论是从文化硬件设施的建设,还是农村公共文化活动的开展方面,那些经济水平相对较高的村庄都在整体上好于那些经济水平较差的村庄。这从总体上印证了他的观点。

从农村文化建设硬件投入方面来看,农村文化建设硬件设施齐全的农村都是那些经济水平相对较高的村庄。笔者一共走访了9个村庄,这些村庄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一,在农村文化硬件建设上的投入也随着经济水平的不同而呈现分化局面,经济水平比较高的村庄,文化硬件设施相对比较齐全。而那些经济状况较差的村庄在公共文化硬件上的建设却是乏善可陈。

比如,蔡甸城区下属的姚家岭村是笔者走访的第一个村庄,村庄内部本身有村民和通过招商的方式建立的几个工厂,村子的经济条件是比较好的,该村在文化建设尤其是文化硬件设施上投入也比较大,修建了专门供老年人休闲娱乐的老年活动室,提供了专供村民锻炼的体育设施,在村委会所在地组建了专门的农村书屋。

蔡甸区下属的玉贤镇会贤村、争光村,无论是集体经济还是村庄个体经济与上面的姚家岭相比都相对较差,这两个村庄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外出打工,所以村里的主要青壮年劳动力都不在村庄,村庄整体缺乏生气。争光村还有几个制衣厂,解决村里的一部分年轻女性的劳动就业,村庄集体开支依靠自身力量还能维持,而会贤村村委会的主要开支则来源于上级部门的转移支付,这两个村庄在农村文化建设上基本上没有投入。笔者在对村庄居民的走访中观察到这两个村庄基本上没有齐全的文化活动设施,也没有可供村民公共活动的广场,在与村庄干部和村民的交谈过程中也了解到,村庄除了每月两场公共性的下乡电影外,并没有组织开展其他的文化建设活动。

在农村的公共文化活动中,整个蔡甸区的农村公共文化活动的总体不多,这也随着村庄经济状况的高低差异呈现活动增减。在城镇所在的中心村会每年定期举办农村文化三下乡活动,在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村庄(比如姚家岭村),乡村里面会组织专门文艺活动队伍,而在一些条件较差的村庄,除了区里

组织的电影下乡工作队每个月放映两场电影以外,基本没有什么公共性的文化娱乐活动,农民平时的文化娱乐活动除了看电视就是打牌,文化娱乐生活十分匮乏。

总体上来看,蔡甸区下辖的各个乡镇在农村文化建设方面做了一些事情,各镇各村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开展了相应的农村文化建设,大多数村庄组织了每月一次的村村电影放映活动,有条件的村庄成立农家书屋,解决农民的看书难问题;配备了可供村民休闲锻炼的文体设施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农民的公共文化生活,笔者在调研走访的过程中向广大的农民询问村庄是否开展了农村文化建设,大部分村民都表示知道或者参与所在村庄的农村文化建设,说明蔡甸区的农村文化建设取得大多数群众的认可。同时从调研的实际来看,现实中农村文化建设也还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制约了新农村文化建设顺利开展,也影响了广大农民参与农村文化建设的热情。

二、蔡甸区基层农村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农民参与不足

蔡甸区农村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农民参与性不足。虽然蔡甸区在基层农村文化建设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广大农民对农村文化建设的参与热情并不高。基层农村文化建设的动力来自上级行政部门推进农村文化建设的压力,而不是基层广大群众发自内心的自发参与。作为农村文化建设和服务的主体,农民对农村文化建设参与热情不高,这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当前农村文化仅仅停留在为建设而建设的表面,而没有将农村新型公共文化建设和服务看作是深层次上整合村庄社区认同,维系村庄共同体的纽带。

当前农民对农村文化建设参与热情不高,总体上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村庄文化建设硬件徒具形式,鲜有光顾者

这是整个蔡甸区乡村文化建设中存在的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这个问题和村庄的经济状况之间并没有表现出一定的相关性。无论是富裕的乡村还是贫穷的乡村,村庄的文化硬件设施普遍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如姚家岭的农村老年活动中心,配备了比较齐全的文化设施,有乒乓球台、棋牌、图书室和电

视机等文化活动设施,但是乒乓球台却被放在室外,已经废弃,活动室内除了一个日常管理人员之外,很少见到村民的身影。而在作为农家书屋首批试点的张湾街道柏岭庄村,在村委会所在地修建的农家书屋,装饰讲究,但在村庄调研的一个上午却未见一名村民前来阅览,尽管村庄周书记表示村民平时读书兴致很高,有很多人到农家书屋借书。在村庄对村民的走访调查中,村民中很少有知道村庄有书屋的。张湾投资近百万修建的文体活动中心,基本上也处于闲置状态,活动中心的两名工作人员除了安排上级布置组织的少量文化活动外,没有组织服务农民的日常工作,公共活动中心的大门平时多数是紧锁着的。这种文化建设只见形式、鲜见利用的状况是当前农村文化建设中存在的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新农村文化建设失去了服务和丰富农民文化生活的本意,仅仅修建一堆文体设施,对推进农村文化建设没有意义。

(二)农民对现有农村文化活动参与热情普遍不高

农民对农村文化建设参与冷淡还表现在对农村公共文化活动的参与上。事实上相对于新农村文化的硬件建设来说,农村的公共文化开展更加稀少。农民对农村公共文化活动的参与程度更低。其中的原因,从调研的实际来看,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第一,组织的公共性文化活动脱离农民需要,当前的农村文化活动中诸如文化下乡,结合重大事件和节日的下乡义演,村庄自己组织的腰鼓队表演等文化形式,宣传意味浓重,属于一种走马观花式的文化活动,并不能深入农民日常生活,并不符合当下农民口味,在一些村庄,开展的农村文化活动已经演变为村干部的一种政绩宣示,并没有为农民的文化活动提供多少资源,农民对此兴致不高。第二,农村公共文化活动的参与,且大多数集中于中心城(乡)镇,限制了广大农民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活动的积极性。农村本身公共文化活动的参与,限制了农民的参与选择,而少量的公共文化活动的参与又集中于中心城镇,提高了农民的参与成本,使农民认为参与农村文化活动与己无关。比如张湾街道的文体活动中心会每天有专门民间组织跳舞活动,丰富居民的文化活动,但这些人从户籍上讲虽然还是农村户口,但是基本上都居住在市镇上的中心村,经济收入

来源已经基本上脱离了农业,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身份。从这一角度来看,乡镇一级的文化活动中心只是一个可供当地人休闲娱乐的去处,服务农民的定位很大程度上已经异化。从这两个方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政府供给与农民需求之间存在很大反差,农民不满意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

(三)民间文化活动组织和资金缺乏

在对农民的走访了解过程中,无论是富裕的村庄还是经济比较落后的乡村,农民虽然对农村文化建设参与热情不高,但对农村文化的需求欲望却很强烈,都表示对当前农村匮乏的农村文化活动的不足,希望自己所在的乡村能够组织一些农民喜闻乐见的乡村文化活动。在一些乡村也有民间社区自发组织的乡村文艺小分队,这些小分队一般在农闲和村庄社区有红白喜事的时候组织起来表演,是具有一定公益性的民间文化组织。这种文艺组织由于扎根于乡村社会内部,所表演的文艺活动贴近农村实际,因此农民对这种文化形式表示十分欢迎,不过由于这种民间文化活动缺乏组织和资金,村庄对民间自发的文化组织活动也并不热心支持,所以这种民间文化组织的生存状况并不乐观。农村中有许多热爱文艺、热心参加农村文化建设的积极分子,但是由于缺乏带头人和资金支持,这些人很难组织起来,农村民间公共文化呈现一种半衰落的状态。

三、农村文化建设的困境——建设与参与之间的困境

事实上,我们看到在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投入上,尽管各个村庄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水平也不尽一致,不过因为上级政府对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视,每个村子都会根据村庄的实际对农村文化建设进行或多或少的投入,但是在走访调研过程中,我们会明显感受到当前农村文化建设的困境,即建设与参与之间的困境。一方面是从上到下的对农民精神文化需求的关注,纷纷对农村文化建设有所投入;另一方面是基层农民对农村文化建设参与热情不高,村庄修建的公共文化设施长期闲置,很少被有效利用,农民参加乡村公共文化活动的积极性不高,当前的农村文化建设呈现出有建设无参与的困境。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笔者在调研的过程一

直对这种现象进行思考,按照一位区里文化主管领导的看法,经济状况较好的村庄农村文化建设应该搞得很好,农民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满意度很高。但现状的状况却是不管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如何,农民对农村文化建设的参与热情都不高,农民的公共文化活动贫乏的状况并不因为乡村的经济条件优越而有所改善。所以农村文化建设的好坏,仅仅依靠经济决定论的观点来解释是不科学的,经济建设搞好了并不意味着文化建设也能真正搞好,我们可以在文化建设的硬件上加大投入,但如果这些投入并不为农民所认可,那么文化建设也是失败的。这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农村文化建设到底要建什么,建设农村文化的真正目的是什么。笔者认为农村文化建设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修建了多少文化硬件设施,而是要重建农村社区的公共性,建设农村文化的目的就是要满足农民的公共性文化需求,构建农民对村庄社区的公共认同。

当前中央之所以重视农村文化建设,并不是仅仅对农村缺乏文化娱乐设施器材的关注,建设的途径也并不只是向农民提供可供农民休闲娱乐的设备,而且是力图通过农村文化建设,重建农民对农村公共性文化的参与机制,以此来消弭农民逐渐显现的文化认同危机,重建农民共同的心灵世界,重建农村居民公共性文化认同,达到维系农村社区的长治久安的战略目的。如果当前的农村文化建设不能实现这一点,无论建设多少农村文化设施也解决不了农村文化存在的问题。所以解决农村文化建设中存在的政府建设和农民参与之间的困境,需要抛弃那种政府向农民送文化、输文化的做法。要从重建公共文化观念、重塑农民公共认同的高度来认识,让农民自己对自己公共文化做主,自己培育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公共文化。

事实上,建设农村文化,重建农村公共文化认同,这与当前农民的文化需要是一致的。农民之所以对农村文化建设的参与性不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前农村文化建设的“形”不能满足农民公共文化认同的“神”。农村文化建设空有建设,未有实质性的文化内容。同时我们也看到,当下以村民自治为基础的基层民主制度的建立,在制度上保障了农民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权利,也为农民公共文化需求的理想

转变为现实提供了可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要重建农村公共性文化,需要构建现代性的全新的文化认同模式,这种文化认同模式既适宜于农村乡土的熟人社会的实际,又适应农民对公共文化建设的参与要求。这既是化解当前农村存在公共文化危机的有效手段,又为基层民主制度的巩固提供文化支撑。

四、以“参与”重建农村的公共文化认同

(一)当前中国农村的文化认同危机

从笔者调研走访的过程来看,当前我国农村文化认同危机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对村庄内部认同的对立化,这种对立表现为村庄精英与村民之间对立;二是对村庄认同的内部分化。

笔者在走访调研期间,在整个乡村社会都能感受到基层村民与精英之间的这种对立。我们向村民进行调研,尤其是单独进行调研的时候,村民在聊天中都难免会流露对村干部的不满,抱怨村干部的贪污腐败,自私自利,不关心村庄公益只顾自己发财致富。这可以概括为村民对村庄社区的“逆”认同,村民对村庄事务并没有表现出不愿过问参与的冷漠感,而是苦于找不到能够有效参与村庄事务的有效途径,或者自己的意见并不能被农村的基层干部采纳,村民与村干部之间存在着对立和矛盾,导致村民对村庄的认同感降低。

对村庄认同的内部分化,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导致经济上差异加大,相当一部分村庄的村民对农村社区的文化认同发生分化,原来村庄内部的社区大认同演变为村庄内部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相同的村庄居民的小认同。在小认同的村民内部,由于村民之间经济政治地位上的同质化,所以对村庄社区事务就会有着相似的看法,相互之间有着很强的认同意识。但是各个小认同群体之间政治经济地位差异巨大,相互之间很少往来,村庄作为一个整体的内聚力下降,村庄社区作为一个整体的整合能力也就遭到了削弱,这显然不利于农村社区持久稳定和长远发展。

无论是村庄居民和精英之间的对立还是村庄内部之间呈现的认同的分化,都是当前中国农村社区公共认同降低的表现,这固然与当前村庄内部在经济上出现分化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村民对村庄公共性的事务参与不足所致。现实的村庄中,越来越多的

村民只关注于自己的私人生活领域,加之,村庄社区没有为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提供健全的制度保障,有的基层政府甚至片面认为农民缺乏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对农民自身提出的要求不加以重视,在农村文化建设上表现为“只输入,不培育”。这样导致农民对公共文化的参与既无心也无力。农民的私性文化有了很大发展的同时,农村的公共文化却日渐式微。这一方面挫伤了农民参与公共性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加深了农村公共性文化的认同危机。

(二)以“参与”消解农村公共文化认同危机,重建新型农村公共文化

用自治精神来作为农民参与文化建设的内在动力,以农民参与来深化农村文化的认同是重建农村公共文化的有效途径。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强调美国人之所以对国家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其原因在于根植于美国基层社会的乡镇自治,为每一个美国公民参与各项公共事务提供了制度保证。现阶段我国的村民自治为农民参与提供了制度上支持,作为一种新型的现代性价值,村民自治既符合传统社会皇权不下县,乡镇自治的历史传统,又符合现代社会的民主潮流,是一种契合实际的农民参与模式。但是,由于各种现实的原因,这种制度的有效性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村民自治还停留在一个很浅的层次上,现实和体制的原因限制了广大村民参与的热情,这不仅仅表现在村民对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参与不足上,更表现在村民对整个村庄事务的无权地位上。在农民对村庄事务的参与得不到有效保障的情况下,谈论村民对村庄社区共同体文化认同,是不现实的。要进行新农村文化建设,增进整个村庄社区共同体的文化认同,必须在制度上保障村民参与村庄事务管理的基本权利。用制度化的手段扩大政治参与,恰恰是应对基层治理难题,增进社区认同的最好方法。

在农村公共文化的建设上,可以通过扩大农民的参与解决农民参与不足的问题。因为生活在村庄的农民自己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并不需要上面过度的指导和教育,这反而损害农民参与农村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农村文化建设之所以存在很多问题,农村文化建设只见其形不见其神,很大程度在于政府越

俎代庖,做本该由农民来做的事情,农民自己想做事政府又不感兴趣。笔者在访谈过程中,询问如果农民自己组织民间的文化团体,开展各种文化活动,农民是否愿意时,大多数的农民表示非常愿意,当问到既然愿意为何却没有人做时,多数农民表示并不是由于村庄缺少这样的文化人才,而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和带头人组织。这实际上就说明当前农村文化建设的一个方向,并不是政府直接出钱出力向农村输出文化,而是应当让农民自己组织和参与来培育农村文化。政府需要做的就是向这些自组织的农村民间文化团体提供资金支持和制度保障,保证他们在乡土社会的健康成长,以此带动农村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在当下的农村,简单的教育宣传式的农村文化建设,并不能培育起村民的文化认同感。

总之,通过实证调研,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农村文化建设必须回归农民本身,通过外在过度的“嵌入式”的向农村输入文化,并不能得到重建农村公共文化,增强农民对公共文化认同的良好效果。所以,在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上,政府应该放弃作为大家长的角色,让农民以自治的精神,自己参与组织农村文化建设,尤其是农村的民间文化建设。政府需要做的是在组织和资金上对农民的文化建设提供帮助和支持。通过农民自己参与来建设新农村文化,才能消弭当前农村社区存在的文化认同危机,重建农村社区公共文化认同,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 [1] 吴理财,夏国锋.农民的文化生活:兴衰与重建——以安徽省为例[J].中国农村观察,2007,(2).
- [2] 吴理财.农村公共文化日渐式微[J].人民论坛,2006,(14).
- [3] 吴理财.用“参与”消解基层“选择性治理”[J].南风窗,2009,(2).

(责任编辑:陈大柴)